

「榨甘蔗」的力量：現象學方法的「看見」

彭榮邦*

摘要

做為一個長期以「現象學心理學」為方法的學者，李維倫教授在目前這個人生的重大轉折處回首前路，他對於自己學術歷程的思索與交代，不只是給其他同行者與後進者一個「做出選擇採取行動」的參考，對他自己而言，想必也是「轉進」哲學界為「照顧哲學」拓荒時手上握著的火把。這篇回應文評論了他在現象學心理學方法上的貢獻，算是為李維倫教授所描繪的「本地風光」做一點補充。

關鍵詞：現象學、現象學心理學、現象學心理學方法

彭 榮 邦*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rongbang@mail.tcu.edu.tw)

首先，我要感謝《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在此回應李維倫教授撰寫的〈從倫理療癒到存在催眠治療：我一路走來的本土風光〉一文。李維倫教授的這篇論文，嚴格地說，並不是針對經驗現象發表見解的研究論文，也不是針對特定理論概念進行回顧的研究論文，而是做為一個學術工作者，對於自己過往學思歷程的回顧。老實說，以李維倫教授的年紀，以及他未來可能的學術貢獻，這樣的學思歷程回顧似乎來得有點太早。從思想的角度，由李維倫教授本人（而非由其他學者），在這個過早的時間點，進行類似思想評述的作法，也似乎顯得有點「自我證成」，沒有經過「時間」這個最嚴格的檢證者的沖刷淘洗。不過，如果考慮到李維倫教授最近讓許多人意外不已的「學術轉彎」——從心理學界跳槽到哲學界任教，他的這篇論文就有了一個不一樣的意義：做為一個長期以「現象學心理學」為方法的學者，在目前這個人生的重大轉折處回首前路，他對於自己學術歷程的思索與交代，不只是給其他同行者與後進者一個「做出選擇採取行動」的參考，對他自己而言，想必也是「轉進」哲學界為「照顧哲學」拓荒時手上握著的火把。李維倫教授在私下的談話中，不時強調我們這些搞「人文心理學」（psychology as a human science）的，是「被歷史潮流帶著往前走」的一群人。雖然這段「歷史潮流」的面貌是什麼，或許還有待未來的辨識，但既然他已經從個人際遇敘說了這個「歷史潮流」的個人側面，他也在文中提及自己的學術著作中「有一大部分在於澄清與細緻化現象學方法論」，因此在這篇回應文中，我也會從我與李維倫教授之間的「因緣際會」談起，夾議夾敘地評論他在現象學心理學方法上的貢獻，算是為李維倫教授所描繪的「本地風光」做一點補充。

李維倫教授在 1999 年在美國杜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花蓮的東華大學任教，當時我還是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的碩士班學生，在余德慧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牽亡」研究。余德慧老師喜歡活潑的學術討論，除了平常的授課，也會另外安排時間進行有點類似「私塾」的研究討論。參與「私塾」的成員，除了他指導的研究生之外，也有其他被他視為「同道」的學者。剛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特別是和余德慧老師一樣都以「現象學」路數進行研究的李維倫教授，自然也被他納入這個研究討論的社群。

我從大學後期就開始上余德慧老師的課，後來更跟著他到花蓮讀研究所，對於他把現象學思維帶入心理學的方式，算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余德慧老師講課的方式，比較是跟著他對經驗現象的思維，透過他對經驗現象的解構、還原，讓熟悉的經驗展現出前所未見的風貌，藉此打開新的認識視野。余德慧老師讓學生「開眼」的能力，自然無庸置疑，當初在台大心理系上課的學生，就有好幾位和我一樣，認了這個人當「老師」，就義無反顧地跟著他到當時因為荒蕪而被學生戲稱為「早蔗田大學」的東華大學。不過，由於余德慧老師的博學多聞（他所在的空間裡，總是有好幾個地方都會放著他正在閱讀的書），而且他對於打開新視野的關注亦遠大於交代他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的來龍去脈，因此當他的學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總是要自己想辦法，用更多的閱讀量才能

勉強跟上他的腳步。或許可以這麼說，余德慧老師帶給學生的，是「啟發」(inspiration)多過於「指導」(instruction)，至少我的經驗是如此。

因此，當余德慧老師請李維倫教授在「私塾」中談談他自己的研究時，我記得余德慧老師對於李維倫教授所使用的現象學方法是略有微詞的。在我的回憶中，余德慧老師應該是對於這麼「步驟化」的研究方法認為太過侷限。從余德慧老師當時所使用的現象學方法讀本之一，Max Van Manen 的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Van Manen, 1990)，我約略可以猜測，對於余德慧老師來說，他當時較為青睞的現象學方法，應該要更有不受限於研究步驟的創意，更仰賴語言本身的「詩意」功能，而不是如同科學心理學般強調研究步驟。

後來，李維倫教授不僅成了我的碩士論文口試委員，我也因緣際會地成了他的第一個研究助理。做為必須參與研究分析的研究助理，我成了他自己以外，最熟悉他的研究方法的第一人（我記得，李維倫教授曾經笑著說，我可能是台灣第一個認真讀完他的博士論文的人）。由於我的學術研究訓練，一直是在余德慧老師的指導下養成的，因此一開始我對於李維倫教授的研究方法，也是覺得綁手綁腳，覺得這麼步驟化的研究方法，或許會扼殺某些創意的出現。不過後來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我慢慢發現李維倫教授這麼步驟化的方法，其實是一種「禁慾式」的嚴謹，其中充滿著現象學對於生活經驗 (lived experience) 近乎信仰般的尊重與虔篤。他不肯錯過受訪者的任何一字一語，彷彿就是認真在實踐著現象學式的「回到事物自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因為除了受訪者的話語，任何對於他們生活經驗的過度揣度，都是對於現象學精神的背反。我後來常以「榨甘蔗」來戲稱李維倫教授的研究方法，因為他在研究過程中的仔細做法，就像是榨甘蔗機處理甘蔗一般，任何一丁點材料都不浪費。

李維倫教授在博士論文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除了根基於杜肯學派 (Duchesne School) 的部分，還有他自己對於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獨特見解。後來幾年，他也修正了杜肯學派實徵現象學的塾基者 Amedeo Giorgi 的方法論，讓原本在 Giorgi 那裡被忽略的存在面向突顯出來。這兩個在方法論上的思索，構成了他在 2004 及 2009 年以中文發表的兩篇方法論文章 (李維倫, 2004; 李維倫、賴憶嫻, 2009)。相較於余德慧老師在方法論上經常被引用的論文及書 (余德慧, 1996/2004)，李維倫教授的這兩篇方法論論文，對於後進者在現象學方法上的入門上，恐怕有余德慧老師當初始料未及的影響。

我近幾年來指導碩士生的研究論文，甚至我自己的研究計畫，在方法論上經常援引的，並不是余德慧老師的書或論文，而是李維倫教授的這兩篇方法論論文。我之所以選擇這麼做，和台灣整體學術環境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係。余德慧老師在心理學領域為詮釋現象學方法開疆闢土，是在 1990 年代的台灣學術時空，當時在楊國樞教授為了建立華人本土心理學，在方法論上鼓勵多元研究範型 (paradigm) 的使用 (楊國樞, 1993)，

因此讓余德慧教授在學術上迥異於科學心理學的「異路」有較為開闊的實踐空間。¹不過，李維倫教授學的雖然是現象學心理學，但他終究不是在當時已有盛名的余德慧老師，他所面對的已經不是解嚴前後較為開放的學術環境，而是快速往管理思維靠攏、強調學術產能及同儕審查的學術環境。在這樣的時空條件下，如同余德慧老師般較為自由的學術概念跨域使用，對於剛開啟學術生涯的李維倫教授來說，或許不是最好的方式。²

李維倫教授在 2004 及 2009 年的這兩篇方法論專文，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他為自己具有異於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宣言 (manifesto)：第一篇根基於他取得美國學界認可的實徵心理學³研究博士論文，第二篇則是根基於他回台灣之後近十年的研究實踐，並且對 Giorgi 的描述現象學方法進行了存在論式的改造，形構出一個有實徵資料支持、步驟清楚嚴謹，甚至自帶學術研究判準的詮釋現象學方法。雖然他在 2016 年才清楚宣告現象學可以做為關注文化現象的本土心理學研究方法 (Lee, 2016)，但實際上他在 2009 年的方法論專文就已經為這個宣告鋪陳了大部分的必要元素。

雖然一開始余德慧老師略有微詞，但是李維倫教授強調現象學的「看見」必須要回到受訪者話語，老老實實、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進行「基本功」的做法，卻逐漸得到學界的認可。特別是碩博士論文的指導上，李維倫教授的兩篇方法論論文顯然受到許多指導教授的青睞，若非直接採用，至少也是重要的參考對象。做為同時受到余德慧老師及李維倫教授兩人影響，也肩負著教學及論文指導任務的我來說，李維倫教授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力道」，我有深刻的體會。

就像我在文章一開始所說的，余德慧老師對學生的啟發，是一種類似「啟蒙」的影響，讓原先被科學心理學的思維方式所侷限的視野，因為他對經驗現象的新穎闡述，而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認識。我想對於讀者來說，余德慧老師的論文，也有類似的「啟蒙」效果。然而，余德慧老師的博學多聞，特別是他對於歐陸思潮的多所引用，對於打開這個新的視野，經常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對於我們這些長年受教於他的學生來說，經常還得自己「開外掛」才跟得上他對經驗現象的迥異思考，對於需要我們進行論文指導的學生，這種知識素養上的落差，更不是一兩年就可以補上的。或許我們可以在類似「質性研究方法」的課程上，協助學生補上必要的現象學知識，甚至也給他們帶來類似的「啟蒙」經驗，但是到實際的研究階段，「啟蒙」的經驗往往伴隨著近似「失語」的困頓（我

¹ 關於余德慧先生在學術上的「異路」，請參閱拙文 (彭榮邦, 2017)。當然，余德慧先生離開台大心理學系到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也給了一個較為開放的「跨領域」可能。

² 余德慧先生對於現象學思想的「挪用」，在當時的學術界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以余德慧先生在 1996 年於《本土心理學研究》所發表的〈文化心理學的詮釋之道〉為例，就受到黃光國先生的嚴厲挑戰 (黃光國, 1996)。黃光國先生在文章的一開始，就對余德慧先生「挪用」哲學思想的方式進行不假辭色的批評：「余教授很喜歡以用西方思想佳的重要概念，來襯托他自己的某些想法。可是這樣做的時候，他卻往往不顧原作者提出這些概念的思想脈絡，反倒依照自己的意思，望文生義，創造出許多新的用法。」(頁 218)

³ 用「實徵」(empirical) 而非「實證」(positivistic) 來指涉心理學所進行的經驗性研究，就我記憶所及，也是楊國樞先生在本土心理學運動的早期就做出的區辨，而這樣的仔細區辨，等於是為後來的多元研究範型，預留了知識上的可能空間。

知道不能像主流心理學這麼看這麼說，但是……) 以及研究提問上的迷惘 (到底該怎麼問才會是生活經驗的探究?)。

李維倫教授為詮釋現象學提供「貌似步驟化」的做法，在這個進入研究實作的階段，是一個讓人用開困頓迷惘，專心面對經驗現象的重要指引。我特別以「貌似步驟化」來描述李維倫教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為了說明，對於他的詮釋現象學方法來說，研究者必須要在每一個步驟中與眼前待分析的資料「搏鬥」，無法像閱讀使用手冊般地「按圖索驥」。李維倫教授所謂的「步驟」，其實更像是轉入現象學思維的路標或指引。只有在與資料的「搏鬥」中逐步鍛鍊出現象學的思維，例如在意義單元的步驟找到貼近現象的結構性描述等，才算是領會了蘊含於其中的現象學方法。

這種與眼前待分析的資料 (主要是受訪者的話語)「搏鬥」的過程，以我的經驗來說，就是手把手帶著學生，從字句的斟酌中長出現象學式「看見」的一種師徒經驗。我必須承認，跟著余德慧老師的學習，是一種拼命跟上的自我學習歷程；以余老師自己的話來說，那些會被他啟發的學生，多少都是他在思想上的「同路人」(like-minded fellow)。而這種在學術上「手把手」的師徒關係，對我來說，是來自李維倫教授的學術饋贈，僅以此回應文表達我的感謝，也就教於本學刊的讀者。

參考文獻

- 余德慧 (1996)。文化心理學的詮釋之道。《本土心理學研究》，6，146-202。
- 余德慧 (2004)。《詮釋現象心理學》。心靈工坊。
- 彭榮邦 (2017)。人文的凝視：追尋余德慧先生逝去未遠的身影。載於余安邦 (主編)，*人文臨床與倫理療癒* (頁 337-360)。五南圖書。
- 李維倫 (2004)。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22，157-200。
- 李維倫、賴憶嫻 (2009)。現象學方法論：存在行動的投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275-321。
- 李維倫 (2021)。從倫理療癒到存在催眠治療：我一路走來的本地風光。《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12 (2)，1-25。
- 楊國樞 (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1，6-88。
- 黃光國 (1996)。文化、知識與存在：反思那“不可反思的”。《本土心理學研究》，6，218-238。
- Lee, W.-L. (2016). Phenomenology as a method for indigenous psychology. In C. T. Fischer, L. Laubscher, & R. Brooke (Eds.), *The qualitative vision for psychology: An invitation to a human science approach* (pp. 156-172).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Van Manen, M. (1990).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he Power of Phenomenological “Seeing”

Rong-Bang Peng*

Abstract

As a scholar who has been dedicated most of his scholarly effo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thod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Dr. Wei-Lun Lee’s review of his life’s work up to this moment, is a valuable reference to his fellow scholars and future scholars. It is also an inventory of his works in the field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which might serve as a torch in his hand to light up his path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care”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This text response is to comment on Dr. Lee’s contribution to th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ical method, as well as a personal addition to the “local scenery” of psychology described by Dr. Lee.

Keywords: phenomenology,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method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Rong-Bang Peng *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
Tzu Chi University (rongbang@mail.tcu.edu.tw)